

奋勇争先建华夏

——清华毕业五十年感言

○王 方（1964 无线电）

大学毕业 50 年，我们完成了母校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的号召，向人民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回首往事，热血沸腾。我为什么一定要入大学深造，这其中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入学前，我是在职干部，有 12 年工龄，是解放战争初期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的无线电报务员和机务员。我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当年刚参加革命工作时，组织分配搞技术工作，在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一面学习，一面工作，随着战局的动荡漂流各地。到 1946 年 7 月毕业，便能上机独立操作，进行无线电收报和发报工作，所用的接收和发射设备都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内部结构十分复杂，和我们学过的不一样，很难掌握。我心中暗下决心，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学会它，掌握它！

当东北解放区相对稳定时，在机务主任甘正同志的组织领导下，完成了最大功率 500 瓦的无线电电信发射机中心（在哈尔滨市），以及备份中心最大功率为 200 瓦的无线电电信发射机中心（在佳木斯市），为延安新华社与东北总分社之间的战时通讯联络、信息收发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为战争的胜利抢占了高地。但这些复杂的制造技术是由被我军强制留用的日军技术人员完成的。他们消极怠工，技术封锁，三

天两头罢工要喝酒吃肉。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当杂工、打下手，很被动也很无奈。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下令为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人民广播电台，由东北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组织上指派我带队，为内蒙当地开创人民广播事业。在这项繁重的任务中，技术设计，工艺制造，安装调试等，诸多核心技术均掌握在旧的留用工程师手中，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还是打下手，干零活。虽然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课，补习数、理、外文，甚至上夜校，听广播讲座等，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仍然强烈期盼入正规大学学习深造。

机会终于来了，1958 年国务院通知规定，在职干部可以报考大学，条件是基层组织批准，年龄小于 30 岁，同等学力等。



2008 年，王方学长（前右 2）的全家福

我如愿以偿，被清华大学录取，真是心花怒放，梦想成真。抛弃官位，日后虽妻离子散也在所不惜。

进入清华之后，我感觉自己年轻了，我比同学们年长 10 岁。看到他们满脸幸福的笑容，很是羡慕，他们参加各类活动，如歌舞团、体操队、民乐团、中长跑队，以及每天下午 4 点以后大操场的体育锻炼，真是如火如荼。我的活动较少，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在学习上，同学们都得心应手，成绩优秀，我则是基础差，底子薄，困难重重，虽经常挑灯夜战，但总是跟不上年青人的步伐。

一年级时，致命的考验不知不觉地来了：红专大辩论，建立又红又专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批判“学而优则仕”的白专道路。当时我曾拒绝担任校广播电台台长，因为怕影响学习；我还认为自己革命人生观问题早已解决。这些观点受到学生党支部的批判，后来被整成“右倾分子”材料，逐级上报到了北京市委，成了反面典型。我因为检讨好，自己上纲上线，才被留下继续学习，以观后效。同期的齐春霖同学同样被定为“右倾分子”，被送回原单位监督劳动。这是后来系主任李传信同志代表校系党组织向我当面道歉平反时才了解到的真相。

第二波考验来得自然，在身体上重新塑造了我。当年，北京各学校都在贯彻上级的三个“百分百”任务，即：劳卫制体育达标 100%，民兵训练完成 100%，大炼钢铁项目开战 100%。

我和同学们选的是劳卫制一级体育达标项目，仰卧起坐、单杠引体向上等顺利过关，长跑 1500 米难度很大，上气不接

下气，突击一周勉强通过了。100 米连跑三周不过关，但不能扯全班的后腿呀。同学们帮我换球鞋，穿运动短裤，专业啦啦队，前呼后拥，中间助跑看秒表，终于在月底前通过了。同学们高兴欢呼，而我像死了一回那样。我终于脱胎换骨了，感觉更年轻了。

第三波打击是小插曲，但是很要命。颐和园的排水沟是流经校园内的，臭气熏天，工程项目是用暗管埋入地下 2 米多深处，我们班分摊到 9 号楼前一段和大礼堂后方一段。在深挖地下土方作业时，由于臭水浸泡，劳累过度，伙食营养差，冷水冲澡，一下子得了阑尾炎。入校医院做手术，院方很重视我这个吃苦耐劳的大龄学生，特由副院长亲自操刀。这位美国归来的华人“洋”大夫，手术做了 4 个小时，下令卧床之后三小时内必须下床活动，避免粘连。想不到三天后出院，伤口因感染全崩裂开来，很是痛苦。原来是“洋”大夫一边吸烟一边拆线，未作消毒处理所致。坚持一周考完了试，又乘 30 多小时火车回家休暑假，不料 40 多天返校后，伤口已然开裂，且流脓淌血，十分严重。还是在护士长的耐心帮助下，用紫外线照射治疗才痊愈的。

人不走运，乱事缠身，智齿长出来了，牙龈红肿得厉害。到牙科拔牙时，女医生找了两名男助手，按着我的双手和头部，她用力抡起 5 磅大锤砸向她手中的夹牙的钳子，几锤下来，智齿不但没下来，还满口流血，疼痛不止，我也被锤昏了过去。我很不满意地对女大夫说，你用兽医那套办法拔牙，对我这个学生太不人道了！

第四波打击是学习上的，可谓悬崖边

□ 值年园地



王方学长在德国与儿子一家合影

上，必须拼命一搏，否则一生梦想将成为泡影。一年级期末，化学考试不及格，必须补考。对我来说这是必然的，从记化学符号、分子式等初级基础开始，一直赶不上进度，而同学们个个化学知识的丰厚，对各种实验也运用自如，几乎全部获得满分。二年级期末，数学考试不及格，成天手忙脚乱，大课听教授讲课，记不全笔记，因为听记不能两全。讲义稿和教科书也各说各话，各有自己的体系，一时弄不懂。在李传信同志的关怀下，派出了辅导员专门帮我复习补考，并特请教研组老师给我讲课，陪我一个多月，整个暑假一起受苦受累。在补考中，我化学得了3-，数学得了3+，勉强闯过了“鬼门关”。

此后，在学习方面倒没有大风大浪和翻车事故，相对比较顺利，特别在专业实验方面，完成快，质量高。累计50多门功课，没有欠账的，最后领到了毕业证书。

在大学期间，我还承担着社会工作，一直担任班级党支部党小组长，担负大量思想政治工作，协助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完成各项任务。我严于律己，热诚待人，与大家和谐相处，争创先进，认真做到共产党员和兄长的责任。

毕业分配由组织决定，1964年3月，我来到东北一家军民结合的小型企业。一开始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压力很大。但在厅长洪学智、厂长王秉林兄长般的热情帮助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们对工厂生产组织多次改造，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抓产品升级换代，如：全国首批袖珍式半导体收音机，批量行销全国；低空警戒雷达长期武装部队。一年就摘掉了企业亏损的帽子。

但是好景不长，在全国的极左劲风吹动下，“四清”运动，领导干部要“洗澡下楼”，个个过不了关，整天闭门思过，背着包袱犯了“错误”。紧接着“文化大革命”来了，疾风暴雨，天塌下来一般。工厂停产了，我被诬为“走资派”、“黑帮”、“里通外国”、“苏修特务”。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摧残，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生病时医院拒绝为“黑帮、敌特”治病，真是生不如死。

1972年10月，我办理组织调动手续，调到了哈尔滨市与家属团聚。暂时脱离了苦海，这一干就是17年，直到退休。这期间，我党经历了拨乱反正，整顿秩序，我被留在省厅工作，从处长到副厅长、总工程师，从事企业管理和技术管理工作，顺势上进，多有建树，为制造业的发展理顺了道路。

50年过去了，仔细想来，确实感慨万千！我心中特别留恋学生时期，那金子般的光辉岁月，同学们坦诚相待，共同追梦，积极向上；师生间亲密无间，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李传信同志兄长般的关爱，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共产党员教育家。